

对“历史的历史性问题”的追问

——读郑坚《吊诡的新人——新文学中的小资产阶级形象研究》

胡 军^①

“知识分子”——准确地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直是中国五四新文学以来所着重描写表现的对象。对它的研究,学界过去往往从社会政治角度出发,通过批判小资产阶级的二重性,去判定知识分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现实环境和知识语境的演变,左翼文化和历史实践重新“浮出历史地表”,这不仅表现在思想界关于“新左派”、“自由派”的论辩,也直接表现为文学研究界对左翼文学(包括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文学、30年代的左联、40年代的延安文学、建国后的17年文学及“文革”文学)关注的热情。其中,知识分子的命运——如何由最初的革命思想启蒙者,跌落为革命的“同路人”,直至“革命对象”这一悲剧性历程,成为了核心问题之一。而这一问题在以往的批判/肯定的二元对立研究范式中较少系统论述,甚至被遗忘。因此,读到郑坚的博士论文专著《吊诡的新人——新文学中的小资产阶级形象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就有一种强烈的理论共鸣,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兴奋。

这部著作最突出的理论价值在于它对“历史的历史性问题”的追问。长期以来,“小资产阶级”被指认为是“反动的”、“落后的”、“散漫的”阶级,对社会主义有“最大、最严重的危险”。而在现代中国,“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的相互缠绕,又构成了一对最本质的关系。这种关系过分自然,以至我们很少去怀疑它们的结合有什么历史“吊诡”之处。在我看来,这些指认和问题的背后是历史的“历史化”过程,也就是说,是话语秩序的生成、确立、强化、扩充及传播过程。因此,只有回到话语形成的现场,清理概念和叙述,并且对话语作历史分析,才能破除问题的自然性和不证自明性。

郑坚显然在材料上下足了功夫。他细致而耐心地梳理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克思、列宁)、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等视野中的小资产阶级形象。从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身份、地位到认知的表征(如“狂热”、“空想”、“幼稚”、“胆怯”、“动摇”等等)。作者的梳理透彻清晰,既有阶段性的整体概括,又有非常精到的细部分析,但由此得出的结论则更有意义。作

者认为,“小资产阶级”的被命名是来自于一套具有浓厚意识形态气息的知识体系,是叙事的产物,是由各个历史阶段无数文本中逐渐想像出来的一种“边缘、模糊、暧昧”的形象。“小资产阶级”的身份、性质、地位的获得,是由高于它的其他社会阶层通过叙述(想象)所赋予的,这样,一种关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话语就被建构起来了。因此,在整个社会阶层中,“小资产阶级”是一个“弱势和次要”的阶级,随时可能成为权力阶层“规训、惩戒、拉拢、依托、监督、打击”的对象。^{[1]4-6}毫无疑问,这一“知识考古”工作不仅从根本上将人们经常使用的,习焉不察的事实、概念、评价的形成和构造方式,其语境及背后的意识形态功能,立体化地勾勒出来了,更为重要的是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被“小资化”及其原罪的形成,找到了更加富有历史感的阐释途径。

是的,20世纪“五四”时代具有“创世纪”意味——诞生了一批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国家处在内忧外患之际,他们以弑父的方式企图割断与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文化)的联系,以西方现代文明为样板,为国家设计出各种现代性方案。然而,让人始料不及的是,作为中国社会激进力量重要源泉的他们,在后来的政治、文化舞台上却以“不够光彩的身份”,甚至是他者的身份参与历史进程,悲剧性地成为被规训的对象。当然,这不是一下子出现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从自觉到自虐,从受虐到被虐、最后发展为集体潜意识的历史过程。知识分子身份和地位的戏剧性变化显然有某种历史“吊诡”的意味。

郑坚认为:“在中国尚未产生小资产阶级前,一整套关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已经准备好了。”^{[1]23}也就是说,马克思、列宁的关于小资产阶级的经典论述,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阐述中国小资产阶级的理论资源。郑坚发现,毛泽东早在写《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时(1925年12月1日),就能够熟练地运用马列主义的社会阶级划分方法认识“知识”以及“知识阶层”。他指出,“毛泽东心目中的知识和知识阶层是与权利、等级、阶级紧密相关的。”“反动派知识阶层”,如“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教授学生、大律师等是”“大资产阶级”的附属物;“许多高等知识分子”,如“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教授学生、小律

① 收稿日期:2007-11-12

作者简介:胡 军,男,湖南工业大学中文系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

师等”归属“中产阶级”;而“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则归属于“小知识分子”。^{[1]27-28}这些区分和描述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特色的小资产阶级理论的形成,即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毛泽东将小资产阶级的问题处理为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分子问题,“并权威地、全面地对被称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立场、态度、意识、缺陷、身份,特别是他们与革命的现代民族国家政权的关系,作了规定性的叙述。”^{[1]32}这样,从《讲话》开始,小资产阶级问题成为了知识分子问题。

在现代革命伦理的召唤下,知识者怀着对光明对拯救和解放的渴望,不惜生命地投身于革命中。但是,“中国式革命”的特点决定了知识分子很可能由革命的先锋者转为革命的羁绊直至革命的对象。《吊诡的新人》清晰地展示出了这种发生在革命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充满戏剧而又令人窒息的奇特现代性景观。在现代性的演进中,尤其是当“革命”成为一种成熟的体制的时候,知识者发现,“革命”距离他们越来越遥远,越来越具有威慑力,甚至越来越恐怖,他们必须要以放弃自己的语言、自尊、自信为代价才能调整好与“革命”的关系。这尤其反映在《讲话》之后。《讲话》对既有的现代话语(以五四话语为核心)采取激进断裂的方式,造就了当代知识分子内在的精神分裂。1951年—1952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新文学选集》,茅盾、巴金、曹禺、何其芳等作家们都在自序中表达了“罪感”和自我焦虑。显然,这是“旧我”的主体感被敲击、打碎后,无法将新的主体认同纳入到自己的感知结构中所造成的精神分裂状。

但是,郑坚并没有把知识分子这一命运简单地理解成为革命“霸权统识”的结果。他看到了这里面的裂痕和复杂性。如作者所说,不应该忽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为了进入革命政权,正是他们最主动、最积极地参与对自己、对他人的批评和批判,以及表达对革命政权、革命领袖的归附和崇敬。的确,正如李陀所言:“如果说毛文体的形成、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的话,正是千万知识分子智慧和努力使这一过程成为可能。”^[2]毕竟,“毛文体”本身能够解答困扰知识分子的有关中国“现代性”问题。

“革命”与知识分子之间的这种错综复杂关系在新文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在某种意义上说,比起政治文本中的“小资产阶级”,文学文本中的“小资产阶级”形象或许更真切些。基于此,郑坚精心选择了新文学史上—批影响较大的经典文本,在对这些文本的分析阐释中,可

以看出他力图从一个总体性理解出发,勾勒出一条关于“历史的”历史线索——小资产阶级叙事关系着现代中国的伟大叙事,具体来说,就是在中国现代性历史进程中,文学如何想像、生产、规划、传播“现代人”或“新人”。在对《沉沦》和《伤逝》分析中,他论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起源”的故事,并饶有兴趣地探讨了小资产阶级情调(如“伤感”、“颓废”、“厌世”等)是如何被建构的,从而预示出他们日后的历史命运。在《倪焕之》《家》、《财主底儿女们》中,他分析了“五四”运动和“大革命”失败后,处于乱世中的知识青年与现代历史进程的紧密而紧张的关系,抽绎出现代性建构中的小资产阶级形象的问题。在对矛盾的“时代女性”分析中,他看到了女性、“革命”、“身体”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在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中,他看到和分析了“革命”与“性”的双重变奏以及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新形象。在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工农兵新文艺中,他辨析了革命政权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共谋、冲突及融合。将总体性的理解融入细密的文本分析中,并且提炼出深刻的理论品质。同时,那些别开生面的文本解读,又赋予了著作的细节阅读的魅力。

人们总是愿意关注历史本身而忽略历史的叙述过程。对这一难以动摇的历史信仰,詹姆逊曾经指出:“历史本身在任何意义上不是一个文本,也不是主导文本或主导叙事,但我们只能了解以文本的形式或叙事模式体现出来的历史,换句话说,我们只能通过预先的本文或叙事建构才能接触历史”。^{[3]253}郑坚的著作正是通过对政治文本和文学文本的读解,进入历史,沿着历史演进的脉络去考察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结构变迁,给我们展示了其命运如此演变的内在逻辑,以此重新建立起知识分子与历史、社会、审美和政治意识形态有效关联。因此,打开这本书就是打开厚重的历史之门,就是一次与文学、文本、历史最真实的相遇。

参考文献:

- [1] 郑坚.吊诡的新人——新文学中的小资产阶级形象研究[M].南昌: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
- [2] 李陀.聆不简单——毛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J].今天,1993(3).
- [3]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M].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黄声波)